

理论探索

书评

大文学当写大时代

□张志忠

尽管说文学可以包罗万象,文学的类型多种多样,但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大文学的本性应当是“大时代的文学”。换言之,能够从微波细澜折射出时代的大气象,从个人命运关涉到百年巨变、历史沧桑,才是我们最为需要的大文学

关于“大文学”,众说纷纭,议论方殷。依我之见,大文学之“大”,体现在它能够深刻反映我们所处的大时代。它应该有广度,有深度,不单是面向现在、面向历史,还应该面向未来;不单是立足本土,还应该放眼世界;不单是关心所谓的人文学的危机,更要思考人文学需要面对与思索的人类新难题。

大文学之所以引起众多的关注,是因为它具有诸多的可能性。歧路亡羊,支脉多多。本文仅取一瓢。尽管说文学可以包罗万象,文学的类型多种多样,但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大文学的本性应当是“大时代的文学”。换言之,能够从微波细澜折射出时代的大气象,从个人命运关涉到百年巨变、历史沧桑,才是我们最为需要的大文学。

时代的一滴水,世人的大波澜

先从一个切近的现象讲起。春节档的电视节目分外热闹,中央台的《好好的时光》成为马年之初的热播剧。庄先进和苏小曼两个人的数十年日常生活,两代人及相关周边人群的恩怨情仇、悲欢离合,足以演绎出一部具有足够容量的时代长卷。回看几十年来国产电视剧的兴盛演进,从《渴望》到《人世间》,年代剧一直是国产电视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地说,在“年代”里讲述中国故事,是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一大重要特征。

年代者,并非时光的自然流淌,而是说,近代以来的中国风云激荡,波流云涌,停滞已久的文明古国被裹挟进全球化与现代性的世界大潮。在巨变浪潮下,任何个体都无法独处于荒山僻野。时代的一滴水,溅落在人们头上,就是狂涛巨澜。粗略地以10年为期,不同历史时段都有各自的核心命题,也造成众多个体的人生盛衰、跌宕起伏。

在《好好的时光》中,庄先进和苏小曼以及他们的儿女们,因为家庭的重组,走到一起。时值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历史大转型期,作品中的很多细节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光景。比如,在公交车上抓获贩卖儿童的人贩子后,庄先进援引某样板戏《沙家浜》唱词称赞苏小曼“沉着机灵有胆量”;专喜搬弄是非、炫耀手中权力的街道办副主任曲柏珍带着手下人冲到苏小曼家,说她养鸽子是搞“资本主义尾巴”,所以要割尾巴、抓“流氓”,最后却再次被精明强干的庄先进击败……凡此种种,展示出新旧时代转换中的种种矛盾冲突。

文艺作品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细节和矛盾冲突中塑造人。就像庄先进,在本职工作上艺高人胆大,在日常生活中的样样拿得起的多面手。在平常岁月中,他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喜爱,因为他能够帮助大家解决许多费解的难题。在时代的转型期,他更是以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干练洒脱的斗争姿态,帮助他人,也帮助自己,改变了生存境遇,也推动了社会现实的嬗变,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变革浪潮中。这正如巴金给成长小说作出的严格界定,人与世界一起成长,“他已经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于两个时代的交叉点,处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寄寓于他身上,通过他来完成。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人”。人的成长恰好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点上,借时代之助力,能够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在很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中,艺术家就是将人物放在转折时代的浪潮中,在真切的生活情境中,展现出人物的成长。

追随巴尔扎克,描摹时代巨变

再回到文学中来。陕西的文学场,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引发特别大的关注。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在人民文艺方向的引领下,这里成为了文学的重镇。这种影响一直延续着,从柳青、杜鹏程,再到路遥、陈忠实等,陕西文学名家辈出。这就既有时势造英雄的地利,也有英雄造时势的自觉。路遥目光超迈,在创作中选材独特。他的《平凡的世界》之所以先声夺人,是因为他率先感悟到那个时代的城乡变革脉搏,率先以浓墨重彩之笔描写孙少平代表的农民工进城和孙少安代表的乡镇企业的崛起。当时只道是寻常,今日回望,这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经济转型的重大关节点,在路遥笔下却又与乡村普通农民的命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环节。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这样表述自己对时代变迁的深刻领悟:“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历史性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度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陈忠实的《白鹿原》厚重沉雄,大气磅礴。小小的白鹿村凝聚了20世纪百年中国的文化难题,中国农业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文化基石,在暴风骤雨般的时代更迭中,面临着种种冲击和挑战;人们曾经为砸烂旧世界而欢欣鼓舞,哪里能够料到,现代中国面临的文化危机,后来才真正凸显出来。因此,再读《白鹿原》,方觉其意味深长,不单是回望历史,还具有时代的前瞻性。

路遥和陈忠实都是柳青的传人,同时也是巴尔扎克的追随者。路遥学习巴尔扎克做时代的“书记官”,陈忠实把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写在《白鹿原》的扉页上。巴尔扎克亦是时代的幸运者和时代的弄潮儿。巴尔扎克雄心勃勃地宣称,拿破仑用剑没有实现的,他要用手中的笔去实现之。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是1821年至1850年间“后拿破仑时代”法国社会剧烈转型(新兴资产阶级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逐渐取代没落贵族而成为主角)的忠实书写的。当下的中国作家,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为大时代而歌。

时代的大变局,文学的大时代

社会各界对“大时代”的感知与回应,自近代以来就屡有发生。

刚刚过去的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1939年的上海“孤岛”时期,郑振铎、孔另境等人编辑了一套丛书,就命名为“大时代文艺丛书”。

郑振铎执笔《大时代文艺丛书序》(1939年5月29日),郑重地说:“文艺工作者在这个大时代里必须更勇敢、更坚毅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如椽的笔,作为刀,作为矛,作为炮弹,为祖国的生存而奋斗……当全民族在经历着空前的火的炼炼的时候,个人是没有,而且也不能有藏身的安稳处所的。挺着胸,擎着火炬,在漫漫长夜里,照耀到天明!”“大时代文艺丛书”由世界书局在1939年7月出版,显示了“孤岛”文学的实绩,宣示了作家们不屈的

抗战精神。

继续向前追溯。1927年12月,鲁迅曾称赞《尘影》反映了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大革命时期,湖南作家黎锦明在广东海陆丰乡村做中学教师,亲历当地农民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失败,目睹革命者的奋斗与殉身,以此写成中篇小说《尘影》,约请鲁迅为之作序。鲁迅在《〈尘影〉题辞》中说:“在我自己,觉得中国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许多为爱的献身者,已经由此得死。在其先,玩着意中而且意外的血的游戏,以愉快和满意,以及单是好看和热闹,赠给身在局内而旁观的人们;但同时也给若干人以重压。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作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鲁迅断然指出,这个革命与震荡、流血与牺牲的大时代,以其生生死死、轰轰烈烈而超越于日常生活之上,但它的未来走向并没有绝然向好的预判,一切要靠人们的顽强奋斗去争取之、改变之。

实际上,这种“不是死,就是生”的大时代,可以追溯到晚清。李鸿章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用“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来描述鸦片战争以来古老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之存亡危机。身处时代的风口浪尖,作为少有的头脑清醒的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力排众议,坚持要开办民族的造船工业。他从天下大势与时代新变讲起,去说服那些阻碍洋务运动的人。

根据以往的这些言说,中西文化的撞击,世界化大市场和全球化视野,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现代化使命……在这样的格局下讨论大文学,可以称之为“大时代的文学”。(有关话题的详解,可参看张志忠、王西强的对话:《“大时代的文学”之起源与特征》,《上海文化》2024年第12期)历史未曾终结,大时代依然在延续。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全球。近期世界与人类,再次遭遇巨大的挑战与危机。许多政界人士和国际关系研究专家纷纷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建构和持续了80余年的世界秩序及其运行规则面临极大挑战,但新的世界秩序与规则的建立,有待各方凝聚共识。旧世界已经灭亡,新世界尚未成形,全球遭遇信任危机、价值危机,丛林法则大行其道,人类再次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

与此同时,人们还需要面对AI发展对人类未来带来的冲击与挑战。世界各国在AI领域的竞争将决定全球的新格局。有一家知名智库公司在其最新发表的报告《国家新纪元: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格局与竞争优势》中提出,从2026年到2030年的这五年,将是决定未来几十年全球格局的关键窗口期。世界正站在一个类似于工业革命的宏大历史转折点上,AI革命也将是一场残酷的国家命运“大洗牌”,全球权力结构将因各国对AI适应能力的差异而发生深刻重组,再次改变世界各国之间的兴衰成败。一些国家将凭借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强大的社会执行力,成为AI时代的胜出者;而另一些国家,尽管可能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军事力量,但如果无法适应AI带来的冲击,最终可能沦为时代的落伍者。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应对,也会生发出更为丰富壮阔的风云变幻和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给文艺艺术提供更为多姿多彩的时代画卷。

如是观之,大时代方兴未艾,大文学天高地阔。大文学就是要写现实的巨变、时代的气象和人民的创造。我们当更加努力。

(作者系山东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从「知人论世」到「生命本体论的诗学」

——读张清华新著《诗歌的肖像》

□向卫国

“生命本体论的诗学”是张清华作为一个诗歌批评家一向坚持的诗学观念。而眼前这部批评著作《诗歌的肖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就是作者依托这一诗学理念展开诗歌批评实践的一次集中展现。这部书的“代序”阐述作者的诗学理念,正文收录一段时期以来的诗歌批评文章,文章的风格均不是干枯的纯粹学术论文,而是带着作者强烈的个性和情感的批评文字。

《诗歌的肖像》“代序”选用了作者写于2023年的文章《在“文本”与“修辞”的背后》。这篇文章详细地阐述了他的“生命本体论的诗学”的观点与思路,为我们理解全书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入口。作者写道:“我在近二十年前提出一个设定,将我个人谈论诗的基本标尺,或者叫最高标尺,设定为‘生命本体论的诗学’。”对这一命名,张清华的论述体现出一种既坚定又迟疑的矛盾性。一方面,他对自己所找到的这个绝对尺度似乎有所疑虑。但我认为,这种疑虑是可以理解的。谁能完全自信地说自己找到了具有根本性价值的“文学理论”和“诗学”呢?另一方面,作为一位资深批评家,张清华对自己在经过长期观察和多维比较思考之后作出的选择,或者说对诗歌本体论的定位,仍然表现出了坚定的信心,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持续而稳定的推进,从而凝结为大量的批评文本。

作者对“生命本体论的诗学”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首先,先后征引了孟子、黑格尔、雅斯贝斯、海德格尔等多位理论家的论述和批评实践文本。孟子“知人论世”的批评观,显然是最为古老的一种“以人为本”的批评观,但它并未成为一种明确的诗学或文学的本体论,其本体论价值是隐含在方法论背后的。与之相比,雅斯贝斯的思想对作者的启发显然更为直接。笔者注意到作者在不同的地方多次征引雅斯贝斯的“一次性的生存”“一次性写作”等言论。雅斯贝斯“一次性”的说法,与当代诗人海子的诗学何其相似:“伟大诗歌是主体人类突人原始性力量的一次性诗歌行动。”这些观点都突出了诗歌与生命之间的紧密联系。其次,作者选取古今中外大批作家和诗人之“生命”与“创作”的合一作为例证。司马迁曾言:“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但丁、荷尔德林、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他们无不是用自己的生命实践,支撑和印证着自己的诗歌理想。其中,尤其以19世纪的一批浪漫主义诗人最为典型,他们个个都是“其诗也壮美,其人也壮烈”,以短暂而绚烂的生命之光幻化为诗歌的语言钻石。此外,作者还写了一批比较纯粹的诗学文章,从不同角度对“生命本体论的诗学”进行了理论的深化。比如,他近年发表的“当代诗学本体论问题”系列文章,聚焦“古典与现代的诗学转换”“诗性正义与诗歌伦理”“诗与真”等命题,体现出系统化的诗学理论建构。

当然,迄今为止,作者在其“生命本体论的诗学”建构中做得最多的,还是批评实践的功夫。要把一种诗学观念落到实处,这是必需的环节和步骤。单就《诗歌的肖像》一书来看,如上文所言,其正文全部是针对具体诗人的批评文章,讨论的对象有徐志摩、郑敏、海子、顾城、伊蕾、欧阳江河、韩东等近30位诗人。作者对所有这些诗人的评论,都是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展开,通过对诗人个体生命历程和真实事件的考证,验证某些具体诗作的真实背景与内涵。当然,这并不是说作者就不进行文本细读,而是说他善于将文本与诗人的个体生命活动进行对比阅读和分析,即所谓“人诗互证”。比如,关于海子的评论,作者并非单纯地从文本出发,而是将海子诗歌文本与其生命进程进行互证才作出相应的诗学评鉴。还有,关于欧阳江河的评论,张清华刻意写出了欧阳江河在生活中的另一面,如此便更生动地刻画出了欧阳江河的多面性。在作者的笔下,我们隐约看到了一个有着多种气质的欧阳江河——他的能力体现在诗歌中,他的有趣则体现在生活中。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诗人背后的文本。

在“修辞”和“文本”背后到底是什么?回到这本书的序言,作者的回答是:“‘修身’和‘人本’才是根本,不只对于写作者来说是如此,对于文本的阐释者也同样适用。”的确,在诗歌批评这一行当,我们需要基于真诚的态度、广阔的胸怀还有专业上的自信,对每一个诗人、每一篇作品作出准确的判断。在这个过程中,对“生命本体论的诗学”的关注,对“人”与“文”相统一的强调,是永远不过时的。

(作者系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教授)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上接第1版)在他看来,推动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厘清其与历史上大众文艺的传承脉络与对应关系,及时开展针对性的追踪理论与理论引导。“专业作家艺术家要主动扛起责任,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既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热情拥抱新大众文艺,更要平等对话的姿态与新大众文艺创作者真诚切磋、互学互鉴。”同时,要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崇尚经典、致敬经典、学习经典的浓厚氛围,“让更广泛的群众认识到,民族文化的精髓与精彩、思想的深度与艺术的精妙,更多承载于、体现在历代传承的文艺经典之中”。广大作家艺术家要携手发力、同向同行,共同营造文艺繁荣兴盛的生动局面,在追求艺术卓越的道路之上坚定信心、勇攀高峰。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繁荣文化创作生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创作的生命线,营造良好文化生态,提升文化原创能力。这让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文联主席、贵州省作协主席欧阳黔森深有感触,也与其的创作实践高度契合。在创作《乌蒙深处》期间,他与团队用近两年时间走遍贵州36个县、156个村寨,深度挖掘各地的叙事潜

能,深入解读能体现人民奋斗精神、彰显山乡巨变的真实现场,让场景本身成为故事的主角,让其蕴含的时代力量自然迸发。欧阳黔森表示,作家要做时代场景的亲历者、记录者、传播者,以场景为笔、生活为墨,将国家发展大叙事转化为有细节、有温度的作品。“唯有沉到一线、深入现场,与场景中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有灵气的精品力作,才能生动展现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动人图景。”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京剧院院长王勇表示,“十五五”规划承前启后,在“十四五”坚实基础基础上,以法治化、制度化方式锚定长远发展,充分彰显了党中央一以贯之的战略定力与治理智慧,为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京剧艺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关键在于守正创新、与时俱进,坚持尊古而不泥古,求新而不失本。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京剧院将科学谋划新阶段发展路径:着力推动传统剧目创造性转化、现代题材创新性表达,建强梯次合理、结构优化的人才队伍,拓展“京剧+文旅”融合场景;提升新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主动服务国家

外交大局。“全院上下将赓续‘一棵菜’精神,以协同聚力之志、久久为功之韧,守护好京剧艺术根脉,擦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名片,为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坚定力量。”

孕育催生更多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

“‘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出台让我倍感振奋,中国作协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被纳入规划,标志着‘两个计划’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工作部署,为文学创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滕贞甫(老藤)坦言,“十五五”规划纲要是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方面突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突出了提升文化原创能力的创作方法,突出了以精神文明建设“五个工程”为标志的创作成果等。“一系列举措都围绕一条生命线,那就是文艺创作的质量。毋庸置疑,文艺创作生产的是精神产品,既然是产品,它的价值和受众就取决于质量高低。”在老藤看来,实施“十五五”规划纲要过程中,要将质量意识贯穿文艺创作全过程,各环

节,不能因数字技术应用、传统模式转型、大数据推广等因素的冲击,就降低精神产品的质量门槛,避免出现海量作品“大水漫灌、泥沙俱下”的现象。“十五五”规划纲要为广大作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舞台,这是时代赋予的重大机遇。作家要紧跟时代步伐、紧扣时代脉搏,脚踏实地、前行不辍,在创作中抵达各自所期待的艺术远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协副主席、中国艺术韩敬群也注意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创作的生命线,营造良好文化生态,提升文化原创能力”的重要表述。他谈到,“十五五”规划纲要为未来五年文艺创作与出版事业擘画了宏伟蓝图,“高质量”的要求并非一般性的宏观强调,而是针对新闻出版、文学艺术领域,鲜明提出聚焦精品创作。未来五年乃至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孕育和催生更多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既是时代所需、人民所盼,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交出的答卷。“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长期主义,尊重艺术创作规律,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海,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努力创作出既传诵一时、更能流传久远的精品力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协副主席、中国艺术

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名誉所长吴文科特别注意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关于文化发展的一个鲜明亮点,是“将‘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作为专门一节单独阐发。”这无疑是对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发展繁荣重大课题的及时关切与有力回应,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治理智慧,深得民心。”吴文科表示,随着互联网的深度普及,其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文艺创作、文化消费的联系日益紧密,网络构建的虚拟世界,已成为与现实物理世界并行不悖、交叉融合的特殊空间。网络在极大便利人们生活、拓宽文艺传播渠道的同时,也滋生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等的存在,不仅困扰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了一定伤害。“可以坚信,通过未来五年‘十五五’规划纲要的贯彻实施,我国信息化条件下的文化治理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网络内容生产、信息发布与传播流程将更加规范,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将在网络空间得到进一步弘扬和光大,让网络成为文艺传播的优质阵地。”

(刘鹏波统稿,路斐斐、许婉霓、罗建森、杨茹涵参与采访)